

晚清

帝国视野
下的英国



马廉颇 著

——以嘉庆道光两朝为中心

人民出版

晚清
帝国
视野
下的英国

马廉颇 著

人
民
出
版
社

——以嘉庆道光两朝为中心

装帧设计:徐 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晚清帝国视野下的英国:以嘉庆、道光两朝为中心/马廉颇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5

ISBN 7-01-003853-8

I. 晚… II. 马… III. 中国-近代史-研究-清后期

IV. K252.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03203 号

晚清帝国视野下的英国

——以嘉庆、道光两朝为中心

WAN QING DIGUO SHIYEXIA DE YINGGUO

马廉颇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新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3 年 5 月第 1 版 2003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张:10.875

字数:264 千字 印数:1-3,000 册

ISBN 7-01-003853-8 定价:20.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序

陈胜彝

160年前的今天,正是《中英南京条约》签订之日。从这个时候起,历史以一种残酷的、血淋淋的方式,将东西方两个大国,也可以说,将东西方两个世界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到一起。由此开始的近代中国多灾多难而又充满希望的历史命运,塑造了我们这个民族的昨天,并且还在继续塑造我们的今天和明天。而迫使傲慢的清朝政府屈服低头,签下这个耻辱的条约的,正是那场在中国人看来倏然降临的鸦片战争。

在过去的一百多年里,与鸦片战争有关的学术课题一直有着特殊的魅力,吸引了一代又一代的学者。历代研究者们所取得的学术成果堪称丰富,20世纪90年代以来,相关课题的研究更是取得了明显的进展。学术视野的拓宽,研究工作的细密化,有关史料挖掘和整理,等等,都标志着对鸦片战争前后这一极为重要的历史时期的研究达到了新的高度。但是,尽管如此,并非所有的问题都得到了深入的探索,人们对不少问题的论述还停留在比较粗浅和过于简单的阶段。随着学术研究事业的不断进步,很多在过去人们只是浮光掠影地给予论述的问题,必然会引起新一代学者的研究兴趣。例如,学习和研究过中国近代史的人都知道,鸦片战争前后以“天朝上国”自居的清朝统治者的盲目自大和闭目塞听,是造成中国逐渐落后于世界潮流,以致在鸦片战争惨遭败绩的主要

原因之一。但是,鸦片战争时期清朝统治集团对西方世界的认识的实际状况究竟如何?这种认识是怎样逐渐演变的?为什么在鸦片战争的惨痛教训之后,在近 20 年的时间内,清朝统治集团依然故我,而中国早期现代化的步伐也迟迟未能启动?正是对这些问题进行的严肃的追问和认真的求索,孕育了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部著作——《晚清帝国视野下的英国》。

学术界已经发表过不少讨论鸦片战争前后中国对西方的认识的研究成果,但大多将“西方”当作一个笼统的概念,具体探讨国人对有代表性的西方国家的认识及其影响的著作,则尚属鲜见。马廉颇同志的这部专著,并没有企望对“鸦片战争前后中国对西方的认识与中国的现代化”这一重大问题进行综合性的、包罗万象式的论述,而是选取鸦片战争前后的嘉庆、道光两朝统治集团对英国的认识为研究对象,这就为自己的研究课题的范围作了清楚的界定。

虽然我们一般将中国近代史的上限划在 1840 年的鸦片战争,但越来越多的中国近代史研究者认识到,要对鸦片战争后的近代史有真正深入的认识,必须将近代史实放到更为广阔的历史背景下认识。作者所重点研究的嘉庆和道光两朝,正是中国历史从中世纪迈向近代门坎之际;同时这也是随着西方向东方的扩张而出现古老的东方与近代的西方开始相互冲突和交汇之时,可谓“古今中西”的结合点。从 18 世纪末到 19 世纪上半叶,中西关系的演变事实上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国人对西方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渐进的过程。如果只是将眼光限定在过于狭小的时间范围,则势必难以对所研究的问题进行全面的认识。本书作者通过自己的研究打破了习惯上的“古代”与“近代”的疆界,以嘉庆、道光两朝为中心,有很多问题甚至上溯到嘉、道以前的时期,或根据需要将考察的范围扩至咸丰朝,对论述的时间范围的选择完全取决于对历史问题

认识的需要。我认为,这种研究方法和眼光都是可取的。

一般来说,在嘉、道时期与中国发生冲撞的所谓“西方”,是指欧美国家。其中英国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可以作为“西方”的代表。英国不仅在对华贸易中占有最大的份额,它在政治和文化等方面对中国的影响也大大先于其他国家。出现在各种官方文献和私家著述中的有关西方的报告和记载也多与英国人有关。可以说,在这一段时期,国人对英国认识的演变过程基本上代表了对西方认识的演变过程。这是本书作者选择“对英国的认识”为研究内容的一个基本的理由。在另一方面,这一时期对西方文明进行观察的群体当中,那些著书立说的士子、学人,往往被当做向西方探求新知的代表,比较得到重视。但能够影响国策,主导具有全局性意义的历史进程的,往往并非那些只具有单纯的士人身份的知识分子,而是身处要津、主持大政的统治者。以往的研究对统治集团的思想动向和认识程度关注不足,这就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我们对这段时期的相关问题认识上的局限。本书以“嘉庆、道光两朝清统治集团对英国的认识与反应”为主题,既突出了重点,也使以往被忽略的历史片断进入了学术研究的视野。当然,从全书内容来看,以“统治集团”为研究对象,主要是反映了作者的研究取向,即通过对统治集团的认识水平的考察,为鸦片战争前后统治者在重大问题上的决策行为提供一种阐释。在具体论述过程中,则难以在“统治集团”和“民间人士”之间作出泾渭分明的严格区分,像魏源、包世臣、梁廷枏这些人,或是曾为统治集团之一员,或是与官员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的思想和作品也就不可避免被纳入作者考察的范围。

本书作者不仅选择了这样一个富有学术价值的课题,而且在具体问题的研究方面也花了大力气,广泛搜集和研读了大量的文

献史料,以踏实严肃的学风,对嘉、道年间清统治集团对英国的认识与反应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论述。如早期官方文献和民间记录中的英国形象,清统治集团对国际关系和地缘政治变动下的中英关系的反应,他们从经济、文化、军事等角度对英国的了解,等等,这些问题均在本书中得到了比较透彻的论述,从而为人们提供了完整的清统治集团对资本主义强国英国认识的状况,并提出了不少很有见地的观点。在此且略举数例。

其一,本书经过仔细的研究后指出,鸦片战争前后的官私文献对英国的介绍,是片面和零碎的。由于长期以来养成的内视型的思维定式,清政府对世界政治格局及国际关系以消极态度对待。当挑战悄然来临时,清统治集团尚沉睡在天朝上国的美梦中。这种观点并非重复已经为人们熟知的常识,而是建立在对具体问题考察的基础上。作者指出,18世纪中叶以后,中国东南沿海和西南边疆因英国势力的侵入而发生地缘政治关系的变化,英国在南亚次大陆的扩张,乾隆朝时还能在一定程度上关注这一问题。嘉庆朝时,英国屡次侵略清王朝的朝贡国廓尔喀,廓尔喀王四次来禀告知驻藏大臣,请求支援。而朝廷上下因为不知道廓尔喀王所言“披楞”即指英国,还以为是次大陆崛起的一个较强的小部落,既不予援助,又不追问“披楞”究竟是何国。英使阿美士德来华时,嘉庆朝的君臣们也没有像乾隆朝一样就这一问题加以诘问。清廷对于疆臣奏报和其他各类文献中的有关信息视而不见,似知非知,以致对西南边疆面临的危机完全失察。直到鸦片战争后,通过驻藏大臣琦善的奏折,清廷才弄清楚原来“披楞”即英国。而这时,英国已完成了征服印度的过程,西南边疆的危机已无可避免。这一认识,不仅提供了一个关于清统治集团的对外认识的具体示例,而且揭示了认识的滞后为国家民族带来的严重后果。这就使作者的研究

没有停留于简单的总结和描述,显示出应有的深度。

其二,以往人们多注重论述清朝上下对外来文化的排斥等问题,而对清朝在军事方面对英国的认识问题相对关注较少。本书以专章对此进行论述,成为一个很显著的特色。在清王朝面临的来自西洋的诸多危机当中,首先表现出来的就是英国对中国的军事威胁。对于这种迫在眉睫的威胁,清朝政府是如何反应和面对的?本书第五章为我们展现了清朝君臣对英国军事文明了解和认识的演变过程。作者既实事求是地陈述了清政府对英国军事文明的认识逐渐扩大和加深的相关史实,同时又指出了统治集团在认识中存在的种种误区,并认为,在军事上“师夷长技”的基本条件在鸦片战争后是具备的,但由于重道轻器,缺乏远见卓识,不懂科技,造成了战后“师夷长技”的夭折,战后十年间仍然寄希望于传统的制夷之道。这种状态延误了国防现代化的启动。这种分析,也是很中肯的。

其三,作者认为,鸦片战争前,国人对英国的富强渐有所知,但对其原因则认识模糊。即使在鸦片战争后,对于英国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与经济结构的了解与认识也还很肤浅。这是战后思想认识不足,难以迅速转变观念,大力发展工商业,从而走向现代化的原因之一。又认为,鸦片战争前后,对以英国为首的西方挑战的性质及其对中国所造成的威胁程度,统治集团还未认识清楚,还处在懵懂无知的状态。清朝统治集团以虚骄自大与故步自封来回应以英国为首的西方挑战,这种认识上的滞后,观念上的守旧,反应方法上的错误,直接导致了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延误。这些观点,建立在扎实的资料和认真分析的基础上,均可谓言之成理。

当然,作为一位跨入学术殿堂不久的青年学者的研究成果,本书在论述的深度方面以及在史料的挖掘、消化和驾驭方面,尚存在

着一些不足之处,作者仍需作进一步的努力。

马廉颇同志的这部著作,是在他的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修改出版的。从1993年到1997年,他在中山大学历史系攻读中国近现代史专业博士学位。我作为他的导师,对他勤勉好学、刻苦自励的精神有深刻的印象。在学位论文题目选定之后,他更是广搜博采,为论文的完成付出了巨大努力,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取得明显的进展。他的论文得到评审委员和答辩委员会的积极肯定,大家都认为这是一篇比较优秀的博士论文。现在,他经过几年的努力,将其论文修改成一部颇有深度的学术著作,交付出版。在这本书即将付梓之时,我深感欣慰和喜悦。我相信,以他已有的扎实基础和他对学术事业的执着精神,他一定能够在这个新的起点上再接再厉,不断取得更有分量的学术成果。是为序。

2002年8月29日于广州

目 录

序	陈胜彝 (1)
绪 论	(1)
第一章 早期中英关系及认识英国的开始	(12)
第一节 英国寻找中国及中英两国的直接接触	(12)
第二节 闭关时代中国认识英国的开始	(21)
第二章 世界与国际关系中的英国	(34)
第一节 世界观的变化与清统治集团的反应	(34)
第二节 世界政治格局的变化与清统治集团的反应 ...	(46)
第三节 地缘政治关系的变化与清统治集团的反应 ...	(61)
一、鸦片战争前英国在南亚次大陆及东南亚的殖民 扩张与统治集团的反应	(65)
二、鸦片战争期间统治集团的“悉夷情”活动与对地缘 政治关系变化的反应	(97)
三、鸦片战争后统治集团对地缘政治关系变化的认识 和反应	(111)
第三章 经济眼光中的英国	(124)
第一节 闭关时代的对外贸易观及对“以贸易为命”的 英国的认识	(124)
第二节 对英国式富强的认识与解释	(139)
第三节 从经济观点看清朝统治集团对英国等西方	

国家的反应	(147)
一、对英国等西方商品冲击的反应	(147)
二、以商制夷论	(151)
第四章 文化视野中的英国	(165)
第一节 鸦片战争前后统治集团对英国等西方	
文化的批评与贬斥	(166)
一、对西方人智力的贬斥	(172)
二、对西方礼俗文化的批评与贬斥	(173)
三、对英国政治制度的批评与贬斥	(175)
四、对西方文化价值的错误评判	(180)
第二节 鸦片战争后少数先进分子对英国与西方	
文化的客观介绍	(183)
一、对英国文化先进性的介绍与认识	(183)
二、对英国政治制度的介绍	(187)
第三节 对英国与西方文化的客观介绍在社会中	
引起的反响	(191)
第五章 鸦片战争前后对英国军事文明的认识	
与反应	(195)
第一节 鸦片战争前统治集团对英国及西方军事	
文明的认识与反应	(195)
第二节 鸦片战争与统治集团对英国军事文明	
的认识与反应	(213)
一、对英国军事文明先进性的认识	(213)
二、认识中的误区	(225)
三、鸦片战争中统治集团对英国自海上入侵的反应	(255)
第三节 战后十年的再认识与争论	(265)

一、战后海防建设中出现的“师夷长技”倾向及其夭折	(265)
二、统治集团中的两种反应之争及国防现代化的延误	(288)
第六章 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延误	(303)
第一节 传统御夷之术的失效、失控与失衡	(303)
第二节 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延误	(312)
附录 主要参考文献	(324)
后 记	(337)

绪 论

自西方在地理大发现后航海到达东方,整个世界就被逐渐纳入政治、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英国等西方列强在世界上的全面拓展,经过几个世纪激烈的竞争和重大的改革与革命,造成了一个全然不同于以往的世界格局,也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等亚洲国家的前途和命运。“西力东渐”是西方经济、军事、文化的全面东侵,中国第一次遭遇到一个文明与社会形态都大大高于自己的国家,它所面临的是“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与“数千年未有之强敌”。从此以后,中国对陌生的西方与变化了的外部世界开始经历了一个认识、反应的过程,这一过程既是反抗西方侵略的过程,又是学习西方先进性的过程。自鸦片战争开始,中国就面临着抵御西方侵略与寻求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之路的双重任务。

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就外部因素的影响而言,最大莫过于欧美国家。现代化开始于欧洲,而英国是第一个走上现代工业化之路的国家。英国的道路在 18 世纪末至 19 世纪中叶成为整个欧洲模仿的对象,是欧洲学习英国而走向现代化的第一阶段。中英双方自 1637 年直接交往后,至 18 世纪中叶英国发生工业革命,再到 19 世纪中叶英国工业革命完成,历经两个多世纪,而工业革命从开始到结束历时近一个世纪,恰好是中国乾、嘉、道三朝清王朝由盛转衰的时期。中国由于长期闭关锁国,在发展中缺乏必要的参照系统,脱离了世界发展的大潮。统治集团沉溺于“康乾盛世”之中,这

种“盛世”没有突破中国历史上的其他“盛世”，没有带来生产力的革命性变革和经济上的结构性转型，它所带来的只是封建社会末期的平衡、稳定和成熟，在这种成熟当中却养成了足够的自我封闭能力以及既得利益集团的壮大和阻碍改革惰性的增强。乾、嘉、道三朝坚持成法的顽固性，只许在传统内进行变革的倾向，对外部世界漠不关心的态度，都反映了封建衰世的来临和儒家文化的保守与陈腐。尽管 1800 年前后的中国人口已超过三亿，几乎为包括俄国在内的欧洲的两倍，且其国内市场与国内贸易也远远超过了欧洲，正如费正清先生所言：“表面上看，清朝的统治到 18 世纪晚期正处于空前的鼎盛时期。但是在 19 世纪中期，它就证明是一个躯壳中空的巨人。”^① 它和英国蒸蒸日上的发展势头呈现相反的趋势，即一个是巨大的跃升，另一个则是巨大的中落，嘉、道间正是跃升的英国和中落的中国两个大国的碰撞、冲突时期，也是中华民族重新审视自身和睁眼看世界的初级阶段。这一时期，英国作为西方执牛耳者，同时又是对华贸易的第一大西方国家，和东方第一大国——中国经历了交往、磨擦、冲突、战争，首先用大炮轰开了天朝的大门，成为侵华的急先锋。鸦片战争前后对于英国的认识也基本上代表了闭关时代中国对西方的认识。对以英国为首的西方的挑战，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嘉、道两朝统治集团是如何认识并作出反应的，这种认识和反应对中国的现代化又是如何影响的。本书拟通过对鸦片战争前后清朝统治集团对英国的认识和反应来探讨中国早期现代化启动延误的深层原因。

鸦片战争前的中西关系，历时三百余年，它不仅为近代中西关

① 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40 页。

系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而且与鸦片战争后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变迁密切相关。中英两国的关系是中西关系中的重要一环,特别是自 18 世纪以来到鸦片战争前后,两国间的关系更是中西关系的核心和缩影。由于种种原因,国内对于清以来的中英关系包括鸦片战争以前嘉庆至道光年间的中英关系研究不够;对于英国这样一个代表与领导着西方侵略中国的国家,有清以来中国人,尤其是统治集团,对它是如何认识和反应的,这种认识和反应如何导致了鸦片战争前后回应西方挑战的失误与中国早期现代化启动的延误,也因此难于有一个系统、全面的认识。笔者不揣浅陋,试图以英国为例从纵向的历史脉络中把握这一时期整个统治集团对以英国为首的西方的认识与反应及其所造成的现代化延误的思想根源。

鸦片战争前中英关系史的研究最早始于美国人马士,1910 年,他的《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 1 卷出版,1918 年,第 2 卷、第 3 卷问世,1926 年,他完成了《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前 4 卷,1929 年,完成了第 5 卷。这些著作对研究中外关系史,特别是 1634 年至 1911 年以来的中英关系史提供了研究的起点。

此后,费正清等人在马士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自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英国、美国、印度、澳大利亚和日本等国学者对鸦片战争与中英关系的研究投入了不少力量,陆续发表了一批有价值的专著和论文。如格林堡《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1951)、费正清《中国沿海贸易与外交》(1953)、韦利《中国人心目中的鸦片战争》(1958)、张馨保《林钦差与鸦片战争》、霍尔特《中国的鸦片战争》(1964)、韦克曼(魏斐德)《大门口的陌生人》(1966)、费伊《鸦片战争》(1975)、比钦《中国的鸦片战争》(1975)、颖里士《鸦片战争》(1976)、谭中《中国和勇敢的新世界》(1978)、普拉茨克《内部的鸦片战争》(1992)。

资料发掘方面也有了明显的突破,如格林堡对怡和洋行档案的查阅和整理;张馨保等对英国档案资料的广泛查阅与专题搜集;佐佐木正哉通过查阅英国档案,将鸦片战争前后有关中英交涉的汉文文件汇编出版,澳籍学者黄宇和的《鸦片战争时期中英外交文件提要》,这些都为深入开展鸦片战争研究提供了便利条件。

从50年代到80年代由费正清及其弟子所形成的“哈佛学派”,在有关中国近代史研究方面,一直居于西方学术界的领导地位。在中国对西方反应方面,费正清、邓嗣禹及其弟子作出了有意义的解释。1954年,费正清与邓嗣禹合著《中国对西方的反应:1839—1923年文献综览》,此书旨在阐明“中国的学者——官员阶层,面对现代西方的侵略扩张,试图了解异己的文明,并且采取行动维护他们自己的文化以及他们的政治和社会制度”等问题,在西方作为研究这一问题的必备文献中的第一流文集被利用^①。费正清以中国的纳贡制度为背景研究中国的对外政策,把中国的世界秩序及对西方的反应纳入到这一理论框架之中。此后这一模式受到了挑战。费正清的弟子张馨保著《林钦差与鸦片战争》,这本书被认为是学术界的一部杰出作品。该书提出“均衡”论,这一观点认为,中西方接触,冲突乃势所难免,其原因在于两者文化上的对立。恰如费正清早期的著作所云:“中国是儒学的、农业的和官僚的社会,不能调适成商业的、工业的和国家主义的西方社会”^②。张氏不怀疑纳贡制度普遍存在于中西关系中,尽管他强调“鸦片贸

① Teng Su-Yu and John K. Fairbank, "China's Response to the West, A Documentary Survey, 1839—1923", Cambridge, Mass, 1954, 第1页及24页。

② Fairbank, "Trade and diplomacy on the China coast 1840—1854", 第22页。

易”是战争爆发的因素,但他仍认为英国的商业扩张及中英两国的文化冲突导致了战争。

此外,谭中教授(印度德里大学讲授亚洲史)在其所著《中国和勇敢的新世界》一书中直接攻击了费正清和哈佛学派,他否认纳贡制度的存在,认为实际上没有一种“制度”,只有一个“习俗”,他指出,鸦片战争前的中英关系,完全不同于中国与纳贡邻邦之间的关系。他也不同意张馨保提出的“均衡论”,认为鸦片战争既非文化冲突,亦非贸易战争,而是由英国一手挑起的战争。

另一强调鸦片贸易在鸦片战争中的作用的著作是费伊的《鸦片战争,1840—1842》(P. W. Fay, *The Opium War 1840—1842*, North Carolina University press, 406p. 1975.),作者从18世纪末叶中英早期贸易开始,一直叙述到鸦片战争的爆发,作者还扩大了鸦片战争的研究的范围,详述了英属印度向中国走私鸦片的准备过程。

由于大部分美国学者都藐视中国对西方的反应,所以,以往的研究都很少注意到中国国内的情况^①。

80年代初,柯文的《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一书对美国以往研究中国近代史的著作进行了全面探讨,试图纠正以西方为中心研究中国近代史的理论偏向,提出以中国为中心研究中国近代史。

90年代,普拉茨克《内部的鸦片战争》(1992)从中国文人官僚集团的派别及宫廷内部的关系方面考察鸦片战争前后统治集团的内部动向,并试图回答为什么经过鸦片战争的惨败后,在中国没有引起对外部世界所采取的外交和军事姿态的彻底反省与检查,从

① 参见[美]安乐博:《哈佛学派在鸦片战争史研究中的模式及近年所受到的挑战》,载《清史研究通讯》,1987年第2期。